

076369

ZHUGUANGQIAN MEIXUE WENJI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签：叶圣陶

责任编辑：郝铭鉴

封面设计：朱展程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插页 精装 7 平装 4 字数 388,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装 1—2,500册 平装 1—21,500册

书号：10078·3298 定价：精装 2.40元 平装 1.65元



一九八一年作者摄于北京



一九二七年作者摄于巴黎

出版说明

朱光潜，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我国著名的美学家。他在青年时代，曾致力于文学、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具有广博的知识。这为他的美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在后来形成了他的美学思想的重要特色。这部文集，主要收他的美学著作，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美学思想，兼收部分与美学直接有关的文学、心理学、哲学著作。

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两卷，收有解放前写作的《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和部分单篇论文；第三、四两卷，收有建国后写作的单篇论文和《西方美学史》；第五卷收有《谈美书简》和全部美学译著的后记，另外还有作者早年用英文写作的《悲剧心理学》的中文译本。全书大致按写作时间排列，个别篇目因考虑到同类文章，上下稍有参差。

朱光潜的美学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他便广泛接触并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美学流派，在我国思想界、美学界均有相当的影响。他当时的美学著作，虽然提供了许多西方美学史上的宝贵资料，并在具体的美学问题上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内容，但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唯心

主义倾向。对此，朱光潜曾在建国以后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

五十年代全国范围的美学讨论，对朱光潜是个巨大的促进。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系列重大的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基石的美学体系。与此同时，他致力于翻译柏拉图、黑格尔、歌德、莱辛等人的美学著作，为促进我国美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为这些西方古典美学著作写出译后记，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美学史，写就了我国第一部《西方美学史》这一煌煌巨著。

作者美学思想的进步，其实也是政治思想的进步。他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起跑线上出发，终于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朱光潜所走过的道路，表明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感召力量，也表明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我们希望这部文集编选的内容和编排的原则，能反映出作者美学思想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文集系由我社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出初步的选目，最后经作者亲自审定。作者认为，这些著作既是历史上的足迹，就应保持历史的原貌，供研究者去分析鉴定。为此，凡文集中所收篇目，从内容到文字，包括同一内容的不同译文，作者尽量不作改动。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主要作了译名的统一和文字的校订工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六月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谈美》。

《文艺心理学》早在一九二九年决定撰写，正式写成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当时作者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一九三三年作者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任教时，曾将该书稿用作教材，并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写了一些章节。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变态心理学》写于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三年出版。在此之前，作者还曾写过《变态心理学派别》一书，开明书店于一九三〇年出版。两书在具体写法上，一个以流派为中心，一个以问题为中心，可以参照阅读；但在材料运用上，大致是相同的，为此本文集中只收《变态心理学》一种。

《谈美》写于一九三二年，同年十一月，作为继作者第一本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作者自称该书是《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但正如朱自清在《〈谈美〉序》中所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没有的。”为此也一并收入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四月

作者自传

我笔名孟实，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个乡村私塾教师。我从六岁到十四岁，在父亲鞭撻之下受了封建私塾教育，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偷看过《西厢记》和《水浒》之类旧小说，学过写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到十五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当时已能写出大致通顺的文章。在小学只待半年，就升入桐城中学。这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所以特重桐城派古文，主要课本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按教师的传授，读时一定要朗诵和背诵，据说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便于自己学习作文。我从此就放弃时文，转而摸索古文。我得益最多的国文教师是潘季野，他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在他的熏陶之下，我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一六年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本想考北京大学，慕的是它的“国故”，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我很失望，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的。除了圈点一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略窥中国文字学门径之外，一无所获。读了一年之后，就碰上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从全国几所高等师范学校里考

选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我考取了。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我就在这所英国人办的大学里学了一点教育学,但主要地还是学了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自然科学的一点常识。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我到香港大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当然漠不相干。不过我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热望。在香港还接触到《新青年》。我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我始而反对,因为自己也在“桐城谬种”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转过弯来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我在美学方面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香港毕业后,通过同班友好高觉敷的介绍,我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应他的邀约,我于一九二二年夏,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的主编。当我的编辑助手的学生是当时还以进步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即后来的姚蓬子。在吴淞时代我开始尝到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我听过李大钊和恽代英两先烈的讲话。由于我受到长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国主义教育,同左派郑振铎和杨贤江,以及右派中国青年党陈启天、李璜等人都有些往来,我虽是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艺界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匡互生当时和无政

府主义者有些往来，还和毛泽东同志同过学，因不满意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而没有被采纳，就愤而辞去教务主任职，掀起一场风潮。我同情他，跟他一起采取断然态度，离开春晖中学跑到上海去另谋生路。我和他到了上海之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上海方面又陆续加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几位朋友。我们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开办的宗旨是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由我草拟后正式公布的。这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接针对着北洋军阀的专制教育。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由我们筹办的开明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开明”是“启蒙”的意思，争取的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这家书店就是解放后由叶圣陶在北京主持的青年书店，即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我把上海的这段经历说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我的大部分著述都是为青年写的，而且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立达学园办起来之后，我就考取安徽官费留英。一九二五年夏，我取道苏联赴英，正值苏联执行新经济政策时代，在火车上和苏联人攀谈过，在莫斯科住过豪华的欧罗巴饭店，也在烟雾弥漫、肮脏嘈杂的小酒店里喝过伏特加，啃过黑面包，留下了一些既兴奋而又不很愉快的印象。到了英国，我就进了由香港大学的苏格兰教师沈顺教授所介绍的爱丁堡大学。我选修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令我至今怀念的导师有英国文学方面的谷里尔生教授，他是荡恩派“哲理诗”的宣扬者，对英国艾略特“近代诗派”和对理查兹派文学批评都起过显著的影响。哲学导师是侃普·斯密斯教授，研究康德哲学

的权威，而教给我的却是怀疑派休谟的《自然宗教的对话》。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还赞许过他。美术史导师布朗老教授用幻灯来就具体艺术杰作说明艺术发展史，课程结束那一天早晨照例请全班学生们吃一餐早点。一九二九年在爱丁堡毕业后，我就转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听浅保斯教授讲莎士比亚，对他的繁琐考证和所谓“版本批评”我感到厌烦，于是把大部分功夫花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伦敦和巴黎只隔一个海峡，所以我同时在巴黎大学注册，偶尔过海去听课，听到该校文学院院长德拉库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他的启发使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前此在爱丁堡大学时我在心理学研究班里宣读过一篇《悲剧的喜感》论文，颇受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的嘉许，劝我以此为基础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于是我起念要写一部《悲剧心理学》，作为博士论文。后来就离开了英国，转到莱茵河畔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则因为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校，地方比较僻静，生活较便宜；二则那地方法语和德语通用，可趁机学习对我的专科极为重要的德语。我的论文《悲剧心理学》是在该校心理学教授夏尔·布朗达尔指导之下写成和通过的。

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听课、预备考试只是我的一小部分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原因是我一直在闹穷，官费经常不发，不得不靠写作来挣稿费吃饭。同时，我也发现边阅读、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比较容易消化，容易深入些。我的大部分解放前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学生时代写出的。一到英国，我就替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搜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原因在我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

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我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此后我写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版处。接着我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和它的缩写本《谈美》；一直是我心中主题的《诗论》，也写出初稿；并译出了我的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此外，我还写了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一部《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总结了我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在罗素的影响之下，我还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火焚掉）。这些科目在现代美学中都还在产生影响。

回国前，由旧中央研究院历史所我的一位高师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除在北大西语系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之外，还拿《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在北大中文系和由朱自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课。后来我的留法老友徐悲鸿又约我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

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地窄狭化

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由的老调。《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们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尽管它只出了两期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至今文艺界还有不少的人记得它（不过抗战胜利后复刊，出了几期就日渐衰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应新任代理四川大学校长的张颐之约，到川大去当文学院院长。刚满一年，国民党二陈派就要撤换张颐而任用他们自己的“四大金刚”之一程天放。我立即挥动“教育自由”的旗帜，掀起轰动一时的“易长风潮”。在这场斗争中我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对我很关心，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们两人交给我一封信，约我去延安参观，我也立即回信给周扬同志说我要去。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国民党通过我的一些留欧好友力加劝阻，又通过现代评论派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我拉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去任教授。这对我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意志不坚定，不但谈不上革命，就连争学术自由或文艺自由，也还是空话。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校内有湘皖两派之争，我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王星拱就拉我当教务长来调和内讧。国民党有个老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因此我就由反对国民党转而靠拢了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曾为国民党的《中央周刊》写了两年稿子，后来集成两本册子，一是《谈文学》，一是《谈修养》。

一九四九年冬，我拒绝乘蒋介石派到北京的飞机去台湾，自留在北大。在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我是重点对象。我受到很

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了文联和全国政协之后，经常得到机会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对比，我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这就决定了我对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全国性的美学问题讨论的态度。

我在四川时期，以重庆为抗战中基地的全国文联曾选举我为理事。解放后不久我在北京恢复了文联理事的身份。在美学讨论开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已分别向我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这次美学大辩论是新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就全国来说，它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和一般青年研究美学的兴趣和热情；就我个人来说，它帮助我认识自己过去宣扬的美学观点大半是片面唯心的。从此我开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我在年近六十时，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我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的就对照四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同时我也逐渐看到美学在我国的落后状况，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往往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至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尤其令人惊讶。因此我立志要多做一些翻译重要资料的工作。原已译过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解放后又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以及黑格尔的《美学》三卷。此外还有些译稿或在《文艺理论译丛》中发表过，或已在“四人帮”时代丧失了。

美学讨论从一九五七年进行到一九六二年，全部发表过的

文章搜集成六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我自己发表的文章还另搜集成一个选本，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约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高级党校召集过一次会议，胡乔木同志就这次美学讨论作了总结性的发言，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今后努力方向。会议还决定派我在高级党校讲了三个月的美学史。前此北大哲学系已成立了美学组，把我从西语系调到哲学系，替美学组训练一批美学教师，我讲的也是西方美学史。一九六二年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我编一部《西方美学史》。于是我就在前此讲过的粗略讲义和资料译稿的基础上编出两卷《西方美学史》，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四人帮”把这部美学史打入冷宫十余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再版。在再版时，我曾把序论和结论部分作了一些修改。这就是解放后我在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缺点仍甚多，特别是我当时思想还未解放，不敢评介我过去颇下过一些功夫的尼采和叔本华以及佛洛伊德派变态心理学，因为这几位在近代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我国都戴过“反动”的帽子。“前修未密，后起转精”，这些遗漏只有待后起者来填补了。

最近几年我参加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辩论，还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谈美书简》通俗小册子。不过我的中心工作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摸索。我重新试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些关键性的章节，并作了注释和评介，想借此澄清一下“异化”、实践观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美和美感、唯心与唯物的分别和关系等这些全世界学术界都在关心和热烈争论的问题。这些八十岁以后的译文、札记和论文都搜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学拾穗集》里。

今年我已开始抽暇试译维柯的《新科学》。这部著作讨论的

是人类怎样从野蛮动物逐渐演变成为文明社会的人，涉及神话和宗教、家族和社会、阶级斗争观点、历史发展观点、美学与语言学的一致性以及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之类重要问题。全书约四十万字，希望明年内可以译完。再下一步就走着看了。需要做的工作总是做不完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

作者说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考虑到广大群众对文艺创作及其理论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而同时文艺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原始资料却仍嫌贫乏，特制定了一套规划，陆续印行一些美学专著和论文选集。现已出版的有王朝闻和李泽厚等同志的著作，接着要出版的就是我的这套多卷本文集。负责编辑广泛地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认真拟定了一个选目，向各方面征求了意见，并且把这些意见转给我看过。提意见的同志都赞成出版这套文集。这对我国美学的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或可起些推动作用；对作者个人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此，谨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赞助完成这项计划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美学在我国有长久的光辉传统。《乐记》、《诗大序》、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之类名著，摆在世界美学文库中，是毫无逊色的。从前我国虽长期闭关，接受外来影响较少，但是《诗品》、《文心雕龙》和《沧浪诗话》都显然有佛典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显然是有益的。自从海禁大开以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美学思想就日益涌进来，把我国美学卷进世界美学潮流中去。特别是在全国解